

论清代喀尔喀地区官吏教育形态

锡莉

(内蒙古大学 蒙古学研究中心,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 本研究通过对清代满、蒙、汉三种文字公文书以及回忆录等第一手资料的分析与探讨,以清代喀尔喀地区为例,概括论述了存在于清代外蒙古地区的官吏培养制度以及各类书吏教习所的整体概况,进而揭示了上述书吏培养制度给予蒙古社会的影响。

关键词: 清代; 喀尔喀地区; 官吏教育

中图分类号: k247

文献标识码: A

在十七世纪,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文书体系传入到清朝统治下的蒙古,为蒙古地区的盟旗制度的巩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蒙古地区,支撑着这个井然有序的文书体系的是各级官署的书吏。在清代蒙古地区,书吏不仅承担着文书工作中的最基础、最重要的环节,而且他们还能够熟练精确地互译满、蒙文公文书。这样训练有素的书吏是在蒙古当地培养的。

清代蒙古人受教育的基本途径有以下三种:一、官府教育。二、贵族私塾教育。三、寺院教育。毋庸置疑,在这三种教育机构中能够承担官吏的教育与培养的机构是官府教育机构。当时,清政府设立了不少官府学校,其中八旗蒙古子弟可求学的官学就有国子监官学,景山官学,圆明园翻译官学,咸安宫蒙古官学等。但是,对于生活在游牧社会的蒙古人,进入中央政府直属官学求学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然而,在清代游牧社会里承担官府教育的是各级官署衙门。譬如,当时外蒙古地区各盟各旗的衙门都设立了培养官吏的教习所。甚至在清末期,库伦办事大臣衙门也创办了官府学校。这些官署衙门起初主要以培养书吏为目的设立了教习所。然而,在当时不施行科举制度的社会背景下,不仅培养出大量书吏,而且还培养了不少官吏候补。这些教习所用有着独特的书吏教育体系。这个教育体系的存在,不但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书吏人才和官吏候补,确保文书工作井然有序地进行。而且在当时作为当地的唯一公办教育机构,为外蒙古地区的文字的普及、识字率的提高以及蒙古文化的兴隆做出了巨大贡献。

本研究基于蒙古国国立中央档案馆所藏清代满、蒙、汉三种文字公文书以及书吏的回忆录等第一手资料,以外蒙古东部二盟为例,概括论述存在于清代外蒙古地区的书吏培养制度以及各类书吏教习所的整体概况,进而揭示上述书吏培养制度给予蒙古社会的影响。

一、 旗官署的书吏教习所

清代外蒙古的图什业图汗部所属各旗的书吏培养制度始于乾隆 41

(1776)年。当时该盟盟长车登道尔吉下令各旗,在全旗范围内招收学童,培养书吏。应此命令,各旗开始召集学童,在官署衙门内教授蒙文,进行书吏培养,并将学童们的学习状况,定期向盟长作汇报。从这些汇报文书中可以了解到学童以及教习所的一些基本情况。即:

学童年龄普遍在 7 到 15 岁之间,主要以学龄阶段为主,也有超出学龄阶段的个别情况。募集人数均在 2-4 人之间,个别也有一次性招收 8-10 人的旗官署。这些学童中有贵族亦有平民。据笔者统计,乾隆 45 (1780) 年,图什业图汗部的 14 个旗的书吏学童共计 48 人,其中贵族 16 人,平民 32 人,

平民占据了总人数的三分之二。由此可看出，当时的书吏培养制度虽然对学童的年龄和募集人数有着限制，但对学童的出身身份并没有限制。可见当时在当地，贵族与平民在受书吏教育方面有着平等的权力。如此公平的书吏培养制度的存在，没有把平民拒之门外，同样赋予了他们接受书吏教育后供职于地方官署衙门的机会。

当时旗官署对学童采取了寄宿的培养制度。学童们寄宿在官署，由官署提供饮食和住所。一个学期为三个月，这与当时旗官署的当班期限相一致。旗官署在对学童的教学方面采取了一对一的教学手法。即，一个书吏负责一个学童教授蒙古文字。当学童能够书写文字之后，以每日抄写大量的文书档案来进行书吏的训练。通过三个月的训练之后，经过考核，成绩优秀者有以下两种选择，一是，作为正式书吏被旗官署采用。二是，去盟官署或库伦办事大臣衙门学习满语文，继续接受高级别的翻译书吏的培训。图什业图汗部各旗的书吏教习所一直延续到清朝瓦解。

二、盟官署的书吏教习所

清代蒙古地区的官署衙门根据需要使用蒙文和满文书写公文书。一般旗与旗之间或旗与盟之间用蒙文，而在盟与盟之间或盟与盟以上的官署之间用满文。由此看来，旗官署需要至少会蒙文的书吏，盟官署需要不仅会蒙文，而且还必须会满文的书吏。当时盟官署承担着培养兼通满蒙文的书吏的重要任务。至今为止笔者发现的有关图什业图汗部盟官署的培养书吏信息的最早的公文书是乾隆46（1781）年的文书。该文书是乾隆46年2月，图什业图汗部盟长下令各旗，向盟官署派学童来学习满文的命令文。应此命令，各旗向盟官署派送学童。这些学童都是有一定蒙文素养的，17岁以下的学童。他们被称为《学习书吏》，主要学习满语文，学期为三个月。学习书吏们从所属旗携带三个月的生活用品来到盟官署所在地。生活用品中主要包括随从、蒙古包、马匹、食物和茶叶等。这些生活用品均由学童们的所属旗提供。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旗和盟官署都是用公费来运营书吏教习所。正因为公费运营，所以无需限制学童的出身，这一制度使得更多的平民接受文字教育，对当时的平民阶层的文化素养的提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三、满汉文学校

光绪24（1898）年，由于库伦办事大臣衙门紧缺书吏，因此当时的库伦办事大臣興廉向理藩院请愿，在库伦设立满汉文学校。不久他的请愿获准，当年的11月1日在大臣衙门设立了“满汉文学校”。该学校的学生主要由图什也图汗部、车臣汗部以及沙弥处的学生各4-5人组成。他们的年龄在17-24岁之间，并且均拥有一定的满文和蒙文素养。他们在满汉文学校主要学习满文和汉文。学习成绩优秀者有的会被库伦办事大臣衙门采用，也有的会被派往所属盟官署做正式书吏。成绩劣差者会被辞退。该学校的运营费用由二盟和沙弥处提供，每年从上述3处征收六百两银（各处二百两）。学生的生活用品及生活费由其所属盟提供。

四、教养学校

光绪34年（1908）年，库伦办事大臣延祉请愿清政府，在库伦设立教养学校。同年8月，库伦满汉文学校扩大规模，改名“教养学校”，主要教授蒙文、满文和汉文。教养学校的运营费用仍然由二盟及沙弥处提供。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贵族以及宗教人士的捐助。有文书记载八世哲布尊丹巴活佛就为教养学校的成立捐助了一万两银。学生的日常生活费依然有其所属盟来承担。当时的教养学校共有40名学生，均来自图什业图汗部、车臣汗部和沙弥处。不同以往的书吏教习所，教养学校制定了一系列的严格规定。例如，对招收人数，学生年龄都有严格规定。还对师生的出勤，学生的学习等方面都有严格规定。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该学校明确地制定了教科书。这些教科书中有《四体清文鑑》和 *čaγan toluoγai, oyun tülhigür* 等书籍。教养学校没有制定学期，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成绩优秀者可直接补大臣衙门的书吏缺，也可被派往所属盟或旗官署作正式书吏。有资料显示，毕业于该教养学校的学生中有被派往各扎萨克旗做官的，也有留在库伦办事大臣衙门补官缺的。

五、结论

清代外蒙古地区的书吏培养体系可追溯到乾隆 41 年或更早，一直延续到清朝瓦解，以其独特的教育方式培养出众多官吏，服务于当时的社会。从制度上看它是个没有身份限制而且是以公共费用运营的教育设施，可定性为官府教育机构。这些制度，使得更多的平民有机会进入官府教育机构，甚至供职于官府的各级行政机构。这在贵族世袭罔替，而且不存在科举制度的蒙古社会，成为平民少有的仕途之一，在当时的社会起到了积极影响。众所周知，以游牧文化为基础的蒙古地区，外蒙古的大部分官署衙门都随季节迁徙。这个官吏培养体系在移动的官署中得以形成，并且发展，甚至延续了近一个半世纪。它的时间上的、空间上的延伸及扩展，正是游牧社会的特征之一，也是游牧文化的精髓所在。

Mongolian government officials' Training System in Outer Mongolia during the Qing Period

XI-Li

(Center for Mongolia Studies of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ohhot, 010021)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scribes' training functions in the banner and league offices in the eastern two leagues_Tusiyetu qan ayimag and cecen qan ayimag_in Outer Mongolia under the Qing rule as well as the scribes' school established at the minister-office of Yeke Kuriy-e in the late Qing period.

Based mainly on historical official documents, the author sheds light on dating the time when the scribes' training was started at the league and banner offices, the methods and contents of education there and, furthermore, clarifies various details related to the scribes' training school of the late Qing period, such as the school management, contents of education and regulations.

The conducted research attests to the significance the scribes' training system, established in Outer Mongolia under the Qing rule, had on Mongolian history. This system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accomplishing the document-based administration in Outer Mongolia. It was also a significant factor in promoting Mongolian culture through spreading Mongolian letters and improving the literacy rate in Mongolian society.

Key words: Qing Dynasty, Outer Mongolia, government officials' Training System

收稿日期: 2016-02-23;

作者简介: 锡莉 (1976-), 女, 蒙古族, 内蒙古呼和浩特人。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历史学博士, 主要从事清代蒙古史研究。